

近代以来中国大学校训与 儒家核心价值的传承延续

翟奎凤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中国主流的社会思想一步步解构儒家文化,在体制建制上,儒学可谓遭到全面放逐。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近现代社会思想文化演变的复杂性,儒学的核心价值在很多方面仍然在延续,这鲜明体现在近代以来的大学校训上。中国近代以来的著名高校校训主流上大多取自于或化用了儒家经典,展现的是儒家的核心价值和根本精神。从经典来看,其取自《大学》《易传》《中庸》《论语》较多;从价值关键词来看,“止于至善”“实事求是”“诚朴”“自强”“明德”“博学”“笃”“厚”“勤”“公”“刚”“毅”等德性精神和价值追求非常醒目、流行;于《周易》卦象而言,其主要强调了乾坤合德的精神,其中又以乾健诚朴、刚毅自强、创造创新、引领一流之乾元精神为主导。“实事求是”在近现代的大放异彩,也是延续了自古以来特别是明清以来儒家实学、实践的客观理性精神。这些精神的背后是在中华民族血液中一直传承着的深邃、深沉、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爱国主义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怀着平天下、世界大同的伟大夙愿。

关键词 大学校训 儒家文化 核心价值 爱国主义

翟奎凤,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250100

校训反映了一个学校的办学宗旨和精神追求,也包含了人才培养的全方位要求,同时,校训往往也反映了一种文化理念和价值选择。在近现代中国,儒学与中华文化遭到攻击和批判,但是很多著名大学的校训依然采用或化用儒家经典中先圣先贤的格言名句。1949年以后,大学校训受革命文化的影响较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大学又纷纷恢复早期的古典校训,一些新兴大学也回到儒家经典世界来找寻、凝练、创造自己的新校训。这些体现儒家精神的校训反映了儒家文化顽强的生命力,能成为校训的这些儒家格言名句,也代表了儒家文化中那些能够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价值追求,因此,这些校训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儒家文化生生不息的核心精神和活的灵魂。

本文为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同思想与近现代儒学转化创新研究”(17BZX061)、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

一、儒学与清末民初的大学校训

晚清高等教育的兴办,与洋务运动有着密切关联。洋务运动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中学主要也就是指儒家的伦理道德,洋务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可以说都是儒学的信奉者和践行者,其中,张之洞对近代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尤为巨大。1902年,张之洞、魏光燾等人创办三江师范学堂;1906年,三江师范学堂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前身),李瑞清主持学堂,他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勉励学生以清苦自励,专心学问,成就大事。这句话的典故,可追溯到北宋汪革(字信民)。朱熹《小学》曰:“汪信民尝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胡康侯闻之,击节叹赏。”^[1]朱熹还曾说:“某观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本心者众矣,可不戒哉!”^[2]本心可谓善心良知。不能咬菜根,就是过不了清苦淡泊的生活。这个校训大旨即“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之义。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于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1914年,赵天麟接任北洋大学校长,他总结了北洋大学近20年的办学经验,用“实事求是”予以概括,并以此作为校训。“实事求是”出自班固《汉书·景十三王传》中的“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大儒颜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3]可见,“实事求是”是儒家学习、教育和实践理念的体现。1896年,盛宣怀还创办了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907年至1920年,著名国学大师唐文治掌校,1910年他提出“勤俭敬信”的校训。唐文治推崇曾国藩的学问,自称“私淑之”;曾国藩在书信中,多以“勤俭敬信”教导亲朋^[4],可见此校训的提出当是受到曾国藩的影响。1909年唐文治在《学校培养人才论》一文也强调:“培养之道,宜加意者,在讲明道德,本身以作则”,“道德,基础也,科学,屋宇垣墉也”^[5]。可见,唐文治重视德育修身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这体现了儒家教育的基本理念,也是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展现。

清华大学校训也体现了浓厚的儒学与中华文化精神,最初制定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章程》第一章“总则”第二条明确提出“本学堂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6]。“进德修业”见《周易》乾卦《文言传》中的“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自强不息”为乾卦的大象辞。可见,早在清华学堂时期,清华大学的教育理念就与《周易》关系极为密切。1914年11月5日,周诒春任清华学校校长时,著名国学大师、儒学大家梁启超受邀到清华演讲,他以《君子》为题,借用《周易》“乾”“坤”两卦的大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激励清华学子养成君子人格,奋发图强。梁启超说:“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曝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之事,何足取焉”,“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7]。梁启超的演讲深深打动了清华师生,周诒春校长决定把“自强不息,厚德载

[1][宋]朱熹:《小学》卷十一,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页。

[2][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杨绳其、周嫔君校点,〔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215页。

[3][汉]班固:《汉书》卷五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2页。

[4]例如同治六年(1867)《复王镇塘》说:“甥在京寓居何处?择交果能得益友否?‘勤俭敬信’四字,刻刻宜自循省,进德修业,皆以此四字为体,慎择交游为用。”(《曾国藩全集·书信》,〔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03页。)

[5]刘露茜、王桐荪编注:《唐文治教育文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6][7]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稿》第一卷“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第260—261页。

物”作为清华校训。

1914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改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谦、郭秉文先后出任校长。江谦为著名儒商张謇的弟子,他继承李瑞清的办学思想,明确校训为“诚”,其作词的校歌第一句即“大哉一诚天下动”。江谦在1915年8月《关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状况报告书》中提出:“本校校训所用诚字,诚者自成,所以成物;先圣至言,实为教育精神之根本。演言之,诚则有信心,有信力。有信心,乃知非教育不足以救国;有信力,乃知非实行教育不足以救国。期望学生以信心为体,以信力为用,此本校训育之主旨也。”^[1]江谦是安徽婺源人,曾在家乡紫阳书院读书,后受业于南京文正书院,为山长张謇赏识。张謇为一代儒商,其实业救国的理念浸润着儒家的爱国信念。江谦一生与张謇都很默契,他们亦师亦友,都有着强烈的儒家救世济民的价值情怀。

晚清民初,在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机下,各种思潮激荡,陈旧僵化、体制化的儒家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新形势新变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挑战。先是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继而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主政教育部,宣布废除尊孔读经。在政治和社会的主流体系中,儒家逐步遭到全面驱除。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形势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高等学校仍采用了“实事求是”“勤俭敬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校训,这突显了儒家价值富有永恒魅力的一面。同时,“诚”字也很受重视,1916年,民国教育部还“以诚字为全国师范学校共同之校训”^[2]。以诚字为训,是民国乃至当代很多大学校训的重要理念。

二、儒学与北洋政府及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大学校训

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1912年教育系统废尊孔读经,然而北洋政府时期的主政者为了维护统治往往强调尊孔读经,这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弹,于是1915年兴起、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达到高潮的新文化运动试图在思想文化和伦理生活层面全面解构儒家对社会的影响。但是无论怎样风云变幻,这一时期一些著名大学的校训依然以儒家经典为依归。

1905年,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校名本身就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3],本义是追求光明,寓含日月生辉、复兴中华之意。1915年,复旦建校十周年之际,时任校长李登辉主持校训制定工作,经与马相伯及众多师生讨论,最后确定以“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作为校训。这句古话出自《论语·子张篇》中的“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这与《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可以相互发挥,都包含了儒家广学、好学、善思以及融会贯通、下学上达、一以贯之、志通大道的学习精神。实际上,马相伯、李登辉信基督教,而且马相伯对孔子儒学也曾有过较为激烈的批评,但马相伯对中华文化很热爱,马相伯、李登辉在文化与教育理念上大体应该是一致的,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很多人可能对儒学在整体上有批评意见,但他们仍然相信儒家经典中一些格言名句还是有着跨时空的智慧和思想魅力,仍然可以为人们信奉,给人以启迪和教育。

1893年,湖广总督、近代教育家张之洞奏请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1913年定名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为当时国内著名教育家张渲,他不仅重视教育改革与创新,而且十分重视学校

[1]《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2]《教育部采录全国师范校长会议案八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03页。

[3][汉]伏胜:《尚书大传》卷一《虞夏传》,《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页。

的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凝练。1919年4月,张渲校长在主持制定校歌、校旗、校徽、校章的同时,还亲自制定校训“朴诚勇”,并亲笔题写^[1]。1906年,清政府在南京创立暨南学堂(暨南大学前身),“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中的“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远播到五洲四海。1918年暨南学堂更名为暨南学校,不久确立校训“忠信笃敬”,此四字校训源于《论语·卫灵公》中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校友郑文奎在《南京时期的暨南学堂》一文中回忆:“校门‘暨南学校’及校训‘忠信笃敬’皆由清末状元张謇书定的。”暨南学校在南京与上海真如地区办学时期的《国立暨南大学校歌》中的“言忠信,行笃敬,尚勉哉,先哲言,终身诵”^[2]等处也包含校训内容。

1918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集美学校师范部(集美大学前身),陈嘉庚、陈敬贤题“诚毅”二字为学校校训。1921年,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学校成立之初,陈嘉庚就以《周易》中的“自强不息”作为学校的校训。陈嘉庚是一代儒商,1921年6月,他聘请林文庆担任厦门大学校长,认为“南洋数百万华侨中,而能通西方物质之科学,兼具中国文化之精神者,当首推林文庆博士”^[3]。林文庆作为新加坡华侨,曾在英国读书学医,是一代名医,又是勇于开拓的企业家,但他对儒学与中华文化很热爱,著有《孔学大纲》(1914年中华书局出版)阐发儒家学说。他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体会到儒家学说的价值,于是在东南亚大力推广儒学,主张年轻一代的华侨应该正规地接受孔子的伦理价值观教育;他还积极参加南洋华侨社会的“孔教复兴运动”^[4],认为“把一个民族的一切传统凭空割除,而仍然希望它能够兴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被切断历史和传统的民族,就好比一棵被砍断的树,势将枯萎和衰落”^[5]。1921年担任厦大校长之后,林文庆“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他用《大学》中的“止于至善”四字作为厦大校训,以培养学生“人人为仁人君子”;学校经常组织尊孔、祭孔活动,孔子的生日被列为重要节日,全校放假,“以示恭祝”^[6]。1924年,林文庆在厦门大学校庆三周年时发表尊孔演说指出:“当陈校董在南洋聘予回任校长时,予询以办学宗旨,陈校董答以当注重中国固有之文化,予是以欣然归国,予亦尊重中国固有之文化也。”^[7]1925年10月14日,他在校内演说中指出“孔教要义”足以留存后世者有“仁”“恕”“平天下”三项。他认为:“《大学》自‘正心’‘诚意’,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乃孔子一贯之教义。近人许多政治家,无一有如此一贯之政治哲学。吾校校章‘止于至善’,亦取义于此。甚望诸君努力研究,能到此地步;尤望将孔子之道,益发昌明光大则幸甚。”^[8]1926年,厦大成立国学研究院,林文庆亲自兼任院长,他除了处理日常校务之外,还从事儒家伦理研究及其他多方面的著述活动,在其校长任内,“厦大私立时期处处标榜儒家思想和中国固有文化,并以之跟当时新思潮互相抗衡”^[9]。

[1]参考骆郁廷主编:《流风甚美:武汉大学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页。

[2]以上转引自夏泉:《略论“忠信笃敬”的暨南校训精神》,载《凝聚暨南精神:暨南大学建校一百周年1906—2006》,〔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3]陈嘉庚:《辟诬》,〔新加坡〕《南洋商报》1924年6月16日,转引自洪永宏《厦门大学校史:1921—1949》第一卷,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4]参见《陈嘉庚、林文庆与厦门大学国学院》,载杨国桢《海海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页。

[5]《海峡华人杂志》1897年社论,转引自郑宏《厦门大学文化的历史与解读》,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

[6]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八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6页。

[7]载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4月14日,引自《厦大校史资料》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页。

[8]林文庆:《孔子生诞日补记》,载《厦大周刊》第124期1925年10月24日。

[9]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年版,第252页。

1921年10月南京高师正式易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原南高师校长郭秉文出任东大校长,他把“止于至善”确立为校训。这与厦大确立“止于至善”为校训大致在同一时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张亚群认为:“郭秉文与林文庆所学专业虽然不同,但都对中西方文化有深刻理解,认同中国传统的大学之道,倡导人类种族文化平等与和平发展,主张大学应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这些都是远见卓识的办学理念,具有恒久价值。”^[1]郭秉文认为:“《大学》里‘平天下’的‘平’字,乃是治学治事最好的座右铭”,“生平为人做事,终是本于平和二字。平乃能和,和乃能进”^[2]。“平天下”是《大学》“八条目”之一,所谓“平”,并非武力征服,而是文化融合;“平天下”是“文治”与“王道”,而非“武功”与“霸道”^[3]。可见,郭秉文的办学理念及价值认同与林文庆有着惊人的相似。在郭秉文、刘伯明的支持下,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东南学人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创办《学衡》杂志,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一个文学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学衡同仁“一方面重视传统,一方面强调理性态度与审慎选择,主张文化无分新旧中外,只问是否永久与普遍”^[4]。

新文化运动前后,儒家遭到全面而严厉的批判,但总体上看,社会思潮的演变是复杂的,尽管这一时期反思、解构、批判传统是主流,但林文庆、郭秉文及学衡派坚定地守护、捍卫、传承着传统中永恒的价值理性和追求——“止于至善”。尽管马相伯对儒家也有着严厉的反省批判意识,但他并不一概反传统,仍然挚爱民族文化中能够跨越时代的真善美,因而以《论语》名言作为复旦校训。

三、儒学与南京国民政府及抗战前后的大学校训

孙中山晚年对儒学的价值有了更多的认同与体悟,这在三民主义的相关论述中有明显反映。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南京国民政府对儒学的价值予以大力提倡,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儒家刚毅顽强的精神品格和民族气节也给国人以很大鼓舞,以儒家为代表的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发扬。

1924年11月,孙中山为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题写训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句话出自《礼记·中庸》,后来成为中山大学校训。孙中山晚年对儒学着意甚多,1924年1月27日至3月间,孙中山多次发表演讲,阐释他的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第六讲(3月2日)中,孙中山指出:“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复起来”,“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5]。显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是儒家的重要价值信念与追求。孙中山还推崇《大学》修齐治平的政治思想,认为“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为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甚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6]

1928年,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改建为国立武汉大学,学校创立初期就确定了“明诚弘毅”四字校训。“明诚”出自《中庸》中的“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弘毅”出自《论语·泰伯篇》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932年,罗家伦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这年10月17日,罗家伦在“总理纪念周”发表了颇有影响的就职演说“中央大学的使命”,他认为中央大学的使命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认为“一个民族要能自立图存,必须具备自己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和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如果缺乏这种文化,其国家必定

[1][3][4]张亚群:《同归而殊途 一致而百虑——郭秉文与林文庆办学理念之比较》,〔南京〕《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2]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年印行,第3页。

[5][6]孙中山:《三民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64页,第68页。

缺少生命的质素,其民族必然要被淘汰”^[1]。基于此,罗家伦从传统文化中提取出“诚朴雄伟”四字作为中央大学校训,他认为:“所谓诚,即谓对学问要行诚意,不以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以为文饰资格的工具”,“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就是‘大雄无畏’的。……若是我们要雄,便非从‘善养吾浩然之气’着手不可”,“伟便有伟大崇高的意思。……凡事总从大的方向做去,民族方有成功”^[2]。显然,诚朴雄伟四字也主要是代表了儒家的人格精神气象。

早在南开初创之时,严范孙便提出了“尚公”“尚能”的主张,并在办学过程中一直践行“公能”二义。1934年,在总结以往办学经验的基础上,老校长张伯苓化《诗经·鲁颂·泂水》中的“允文允武”为“允公允能”,将其定为南开校训。他说:“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只有大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就是要作到最能。能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3]。“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4]。1944年,张伯苓在“允公允能”的后面又加上“日新月异”,由此形成了南开大学今日的完整校训。“天下为公”是儒家的根本追求,“平天下”更需要实践才能,《大学》引商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曰“日新其德”,因此南开校训体现的也是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张伯苓也有基督信仰背景,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儒学与中华文化的认同,他认为自己心灵最深处是爱国救国的情怀,并强调要“整理中国固有之文化,摘其适合于现代潮流者,阐扬而光大之,奉为国魂,并推而广之,以求贡献于全世界”,“昔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亦此旨耳”,“此种删定重任,愿与诸先生共勉之”^[5]。

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创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浙江巡抚廖寿丰在应林启之请具折奏办新式书院的奏折中说:“窃维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而讲求实学,要必先正其志趣,以精其术业。《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合古今中外而不易者也。……名曰求是书院。”^[6]可见“求是”二字承袭着明清时期儒学发展的实学精神。求是书院后来改为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等,1928年始为国立浙江大学。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1938年11月,在浙大西迁途中,竺可桢提出以“求是”作为浙大校训,同月还以“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为主题发表演讲,认为“本校推原历史的渊承,深维治学的精义,特定‘求是’二字为校训,阳明先生这样的话,正是‘求是’二字的最好注释,我们治学做人之最好指示”^[7],强调“王阳明先生正是今日国难中大学生最好的典范”,应学习阳明“致知力学的精神”“内省力行的精神”“艰苦卓绝的精神”,最后又特别指出“处现在外侮深入、国步艰危的时候,阳明先生的伟大处,更应为学者所取法者,尤在他那公忠报国的精神”^[8]。1939年2月,竺校长对一年级新生作了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讲话,强调:“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

[1][2]《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第299-300页。

[3]张锡祚:《张伯苓先生传略》,天津文史资料编委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

[4]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张伯苓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42页。

[5]张伯苓:《我之教育目的》,原《南开双周》第7卷第1期,引自《现代大学校长文丛·张伯苓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72页。

[6]《请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折》,朱有琢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86年版,第250-251页。

[7][8]《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53页,第452-455页。

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1],“像张苍水”^[2]这样杀身成仁,也是为了求是”^[3]。时值抗日战争时期,竺校长的讲话也处处透出以学术救国、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竺可桢的诠释中,求是不仅是求真理,还同时是求“仁义”,求“公忠报国”。

1938年抗战中的西南联大常委会于10月6日开会,决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组成校歌校训制作委员会,冯友兰为召集人。经广泛征集和研究讨论,校训拟为“刚健笃实”,并呈报常委会,常委会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刚健笃实”还不能充分体现联大风貌,于是改为“刚毅坚卓”^[4]。《周易》大畜卦彖辞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显然,用“刚健笃实”虽古典味足,但“刚毅坚卓”更能反映出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国人不屈不挠、坚不可摧、追求卓越的民族气节。1938年10月下旬,西北联合大学也以类似的方式,确立了“公诚勤朴”四字校训。

结语:近代以来大学校训与儒家核心价值之省察

1949年以后,政治激励性话语成为校训主流,如“团结”“勤奋”“求实”“创新”“严谨”等校训铺天盖地,好多高校废除了原来充满儒学与传统文化气息的古典校训。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儒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重新被人们重视,很多著名高校又纷纷恢复了早期的古典校训,如中山大学在1994年建校70周年之际,恢复了老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复旦大学也在其90华诞的1995年,树立起一座“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纪念墙。1995年,暨南大学恢复了“忠信笃敬”的校训。1936年河南大学校门建成之际,校长许心武先生取“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作为校训,用柳体金字书写悬挂在大门背面,正中上额横书“止于至善”,左书“明德”,右书“新民”。大门建成后不久即遭“七七”事变,虽历经八年抗战,幸未毁于战火,但1953年,学校大门背面的校训被去掉了。2002年河南大学90周年校庆之际,“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校训又重新悬于大门内侧。也有一些大学从儒家或国学经典选取格言名句来构建其新校训。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6年的新校训“智周万物,道济天下”取自《易传·系辞》中的“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这是借用传统经典。更多的大学新校训则是化用儒家经典,参之以现代理念或各自的办学特色,如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确定的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目前,“博学”“明德”“自强”“厚德”“格物”“致知”“至善”“笃”“诚”“公”“勤”等关键词在中国大学校训中非常流行。

近代以来,儒学及其价值体系在不断被解构,但同时,近代以来这些著名大学的校训,也展现出儒家核心价值在经历时代最严峻的考验后所呈现出的顽强的生命力。这些名校的校长或校主早年多接受过儒学与传统经典的洗礼,后来游历欧美,有着宽广的世界视野和非常理性的现代精神,他们身上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浓郁的民族情怀,教育救国是他们的神圣使命。他们对儒学与中华文化内在价值中富有永恒魅力的一面有很深的体悟,并在办学实践中能够发扬光大这些核心价值。总的来看,他们确立校训时对儒家核心价值的提取,多取自《大学》《中庸》《论语》《易传》,较少取自《孟子》。名校中似只有山东大学2001年确立的新校训“学无止境,气有浩然”借用了《孟子》“浩然之气”

[1][3]《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61页,第462页。

[2]张煌言,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南明儒将、诗人,著名抗清英雄,与岳飞、于谦并称“西湖三杰”。

[4]杨光社:《西南联大的校风和校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编《昆明文史资料集萃》第三卷,〔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5页。

一语。这些校训中的核心价值也大体上是宋儒的经典体系。就《大学》而言,宋儒多重视八条目之“格物”“致知”,而在近现代这些高校的校训中,三纲领之“明德”“新民”特别是“止于至善”则广受重视;如果最为抽象地理解儒家,笔者认为儒家的根本精神或根本价值可以说就是“止于至善”。《中庸》中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也完整或部分地被很多大学确立为校训,特别是“博学”彰显了儒家“学”的精神的重要性,也意味着儒家的面向是很广博的,并非仅仅是道德伦理,其内在地也涵摄了科学求真的向度。如果说“厚德”“明德”“崇德”代表了儒家包容、自明自修之坤德,而“自强”“刚毅”“坚卓”“雄伟”“日新”则代表了儒家敢为人先、开拓创新、追求富强之乾德。“诚”在近现代大学校训中也很常见,在儒家的诠释系统中,诚朴可谓天道乾德,相应地敬信是地道坤德。过去,“求是”“求实”“实事求是”在儒学与传统文化经典中并不是很突出,但在近现代不断被放大,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精神融会的一大亮点,这种科学精神、实学精神是对传统儒学的发展。

但是,在传统儒学中一向认为是核心价值的“仁”在近现代大学校训中并不是很受青睐,反而是一些教会大学强调了“仁爱”,如金陵大学校训为“诚、真、勤、仁”,辅仁大学校训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福建协和大学校训为“仁爱、牺牲、服务”。教会大学突显仁爱,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与基督教宣扬的博爱精神能够相互呼应。1931年,国民政府曾要求所有学校都要把孙中山强调的中华美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校训^[1],这种政治化的共同校训实际上并没有为著名高校继承下来。总体上看,纵观近现代著名大学校训,忠孝、仁爱之类的传统德目并没有得到彰显,与此同时,“止于至善”“实事求是”“诚朴”“自强”“明德”“博学”“笃”“厚”“勤”“公”“刚”“毅”等德性精神和价值追求非常醒目流行。于经典而言,《大学》《周易》影响最大,古代并没有特别受重视的“实事求是”在近现代大放异彩。这些价值用《周易》的话语取象来概括,主要的也就是乾坤卦的精神。乾卦乾元的精神特别受重视,其意味着刚健自强、生生不息、除旧开新、坚卓自立、引领一流。“诚朴”“弘毅”“勤劳”“求是”“公能”可归为乾德,“博学”“笃”“厚”可归为坤德。乾坤一体,乾德为统,合起来就是一种自强不息的“龙”的精神。作为龙的传人,中华民族这种“龙德”精神也具体展开为一种深邃、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所有这些近现代大学校训都贯穿、洋溢着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对民族历史文化有着坚定的自信。当然,这种对文化文明的自信、自豪、自尊,内含着对民族文化具体因素的扬弃,内含着吐故纳新、追求富强。马相伯、张伯苓虽信仰基督,但这种信仰背后还有更深、更根本的信仰,那就是对中华民族的爱,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中华民族富强起来,昂首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不再受欺凌。同时,这种爱国主义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怀着平天下、世界大同的伟大夙愿。这也是通过考察近代以来大学校训,对儒学核心价值和根本精神的一个领悟,对今天我们思考儒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很有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曾逸文〕

[1]《教育部关于各级学校应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制匾悬挂的训令》(1931年7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教育》分册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6-77页。